

〔19〕見証的生活



處於乾燥與寧靜的沙漠中，人便會自覺到自己的渺小；這種自覺，正襯托出人的偉大。

① 見証

歌星把一首歌唱得美妙，於是，人便因喜歡聽這首歌而連帶愛上這歌手。後來，當人真的愛上這位歌手時，便會因他而喜愛他的歌了。作見証——就像一位歌星，別人因與基督一起生活，而信仰基督。聖保祿宗徒說：「我們有一個寶貝，這寶貝是放在瓦罇裏的。」（格後·4:7）如果基督是寶貝，基督徒是瓦罇，那麼，在瓦罇完整無缺時，人才可以保存那寶貝，萬一瓦罇打破，寶貝便失掉了。

當船在大海上航行的時候，最危險的，並不是遇上狂風巨浪，而是遇上冰山，因為冰山可見到的那部份，只屬很少，而不能見到的部份，比可見的部份要多很多倍。

一個基督徒，如果只憑某個見証人的作為而去相信基督，他的危險，就如在海上航行，見到冰山一樣。

若只看教會中的著名人物，而相信主的話，則太危險了。若因這些明星，以為基督徒就是這樣的，就未免太美化了。基督徒每有他們失敗的、受挫折的、掙扎的一面。

若有人說：「你們信基督吧！你看我多麼的快活。」人若因此相信基督，他信的並非基督，而是信說這話的人。萬一這人倒下來失敗了，則信他的人便會失望。

這麼說，這些好人好事也是基督的反見証。因為他們阻礙了別人去了解，原來跟隨基督亦有他不美滿的、掙扎的一面。

② 見証人的影響力

在一個商業社會中，偶像的影響力有很大的商業價值。比如廣告，每每由羣衆所崇拜的偶像去推銷貨品。由於偶像的吸引力，羣衆不必知道貨物的真實價值就相信廣告的說話。

另一方面，羣衆對他們的偶像有所要求，他們的偶像的生活，要符合羣衆的要求。他們對見証人的要求一樣，人們覺得一個神父或修女，他們的行為是純潔的，操守是高尚的。萬一，這見証人的行為與羣衆所要求的不符合時，就會因對偶像厭惡、摒棄而接連厭惡和摒棄他們的信仰。

其實，我們不應該盲目崇拜偶像，即使那見証人的作為很值得我們崇敬，我們應深入一層去看、去了解，看看是什麼動力，使他能夠與別不同，了解他們背後的動力，是什麼精神、思想去支持他們。當我們了解這動力之後，也可以發掘這動力，作為自己的力量。不一定是憑見証人的行實才相信主。

見証是什麼？怎樣才是為基督作証？

為什麼人見到我要決定信基督？

人要在我身上見到些什麼才能決定信基督呢？你是見到一個好人，才決定信基督嗎？

基督屬於天父的境界，好人屬於人的境界，究竟人和天父間有什麼橋樑？使人能從人的表現中去看天父？

在現代的世界裏，一切崇尚科學、武力以及金錢萬能。但可幸仍然有一些能夠摒除了國家、種族的界限，把自己的能力，甚至生命，為了「愛」而付出了。他們能夠默默地耕耘，完全投入該民族中。他們這種超然忘我的精神，並不是與生俱來的，他們都是與普通人無異的人，只是他們能憑着他們的愛心、堅強的意志和鍥而不捨的精神，使他們達到服務他人的理想。

③嘉祿富高

(CHARLES DE FOUCAULD
1858—1916)

法國人，1858年出生於法國的一個貴族家庭，長大後從軍，過着揮霍而不羈的生活，沒有人能想到，若干年後，他成了一個罕有的虔誠基督徒。他說：

「當我一相信天主存在時，我就馬上知道除了爲他而活外，我不能再做其他的了。」他後來加入了聖母雪地苦修院，成爲神父。

他要宣揚福音——不是通過講道，也不從訓示着手，而是越來越深地透過單純的愛。他在阿爾及利亞的一個沙漠綠洲：本尼亞比（BEM-ABBE'S）住下。每天用很長的時間祈禱。他親自照顧病苦貧窮的人；替奴隸贖身，還向殖民當局請求撤除販賣奴隸的制度，可惜沒有成功。他和法國駐防在那裏的士兵交朋友，爲他們獻感恩祭。偶而，也和他們一同進餐。他希望每個人都把他看成自己的親兄弟。

在本尼亞比住了兩年，有人請他深入一千公里到撒哈拉沙漠去。嘉祿的性格雖然很強，但面對這重大決定時也感到戰慄，他常說：「死亡是責任的標記」他決定前往。漸漸地，達曼拉瑟（TAM-ANRESSET）這個在撒哈拉沙漠中的一個小綠洲，就成了他的家。在艱苦中，嘉祿個人的人格得到最高的發展，在他的記錄中寫着：「常常是五個月內都沒有歐洲的消息，也沒有感恩祭，只有我自己一人。」後來，羅馬方面發來特可，准許他獨自一人奉獻感恩祭，從此，他得到無比的喜樂。

在沙漠中，他處在謙虛的和已被遺忘的杜亞力（TUAREG）人的愛中，把自己也當作杜亞力人。杜亞力人的語言還

沒有寫成文字，他爲他們翻譯福音，把他們的格言和長詩寫成一本詩集。嘉祿拚命的工作，他的目標是每日學習11小時。但他總是很開心接受任何時候任何人的打擾，在他們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對他來說，都是重要的，他甚至寫信給他的表姐向她要黑色的染料給杜亞力婦女染頭髮。

嘉祿死後，沒有留下一個追隨他的人，但他所寫的東西，油印出來後，便開始流傳。雷奈巴辛（RENE' BASIN）撰寫了他的生平。一些小團體，便陸續把他的理想實行起來。

「我播種，別人收割。」「就像每天滴水，日久就會把石頭滴穿。」這兩句嘉祿常說的話正好道出了他的一生所作的事情。



④ 雷鳴遠 (VINCENT LEBBE 1877—1940)

光著頭、腳穿布鞋、矮矮的個兒、瘦小的身軀上，穿的是中國粗布的大褂，一隻手拿着中國的長桿烟袋，另一隻手拿着一個小包袱，裡面裝的是日課本子和錢袋，在他安靜祥和的面上，一雙眼睛發射出炯炯的光芒，而在裏面隱藏着的，却是一座在爆炸中火山般的熱誠和幹勁。這就是在中國生活了40年的雷鳴遠神父。

雷鳴遠（1877—1940）比利時人，後歸化入了中國籍，他自少熱愛中國，在他生活的40年裏，中國正處於一個極紛亂的年代，自外國列強瓜分中國起，至辛亥革命戰爭、日本的全面侵略、及後有軍閥的割據和黨派間的權力鬥爭，雷神父以一個完全的中國人的身份，切實實地為中國貢獻了他的畢生。他為中國所做的事情，不勝枚舉。在1916年，天津的老西開事件中，雷神父所付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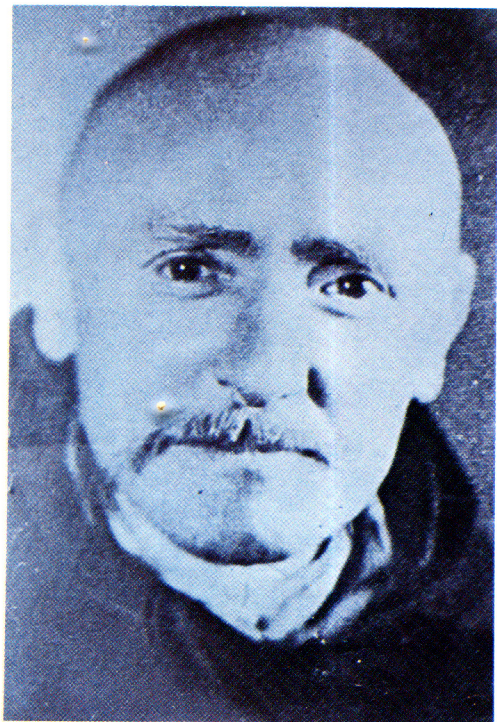
真誠和對中國國土、人民的熱愛，可以說是遠比一個土生的中國人為甚。

「老西開」是在天津市法國租界附近的地方。那時，天津的主教在那裏興建了一座主教府，這變成了法國佔領中國領土的一個機會，他們早已對中國領土滿懷野心，這時便藉着保護教堂為理由，公然把法國旗插在老西開的土地上，最後，竟用暴力衝入「老西開」，將中國警察轟走，擅自把老西開劃歸法國租界，向當地居民徵收稅捐。天津的市民初時誤會教會與法國朋比為奸，而主教對這事却置身度外。雷神父為了公道，挺身而出，竭力為保護中國領土及中國人民的尊嚴而努力。當時，長上責難他，當權者排斥他，全不聽他的勸告，甚至強加罪名於他身上，把他在天津15年來所建樹的工作全不理會，一次再次地把他調離天津。而雷神父還是不屈不撓地，領導中國人民爭取自己的國土。

「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是雷神父提倡的口號，他是絕對的實行。在凜冽的隆冬裏，他曾經把自己唯一的被子也送了給他見到的窮人。

1926年，雷神父促成了國籍教區成立運動。同年10月，教宗親手祝聖六位中國主教。1927年，他創立的小兄弟會正式成立了。1928年，德來修女會亦相繼成立。此外，他傳教、演說、辦文化刊物，投入抗日戰爭，身先士卒地參與前線的救護工作，那時他已經五十多歲，當瘦小而垂老的他，担着傷兵的担架時，無數已經頹委了的軍心，亦被燃燒振奮起來。當他面臨死亡的時候，他還是不改一貫積極工作的態度，他說：「我死後還要為中國抗戰勝利祈禱。」

雷鳴遠神父——他的一生，已溶入了我們中國的近代史中，而他的精神，正是他所說的「死而已」。



⑤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

「又一次了，主——雖然這次不是在法國恩河的森林，而是在亞洲的大平原——我既沒有麵飽、葡萄酒、也沒有祭台……我，你的神父，要以大地做我的祭台，在這上面，把全世界的勞力和痛苦都獻給你……」

德日進——我們可以想像他——修長的身材，裹在皮毛的風衣裏，他那長而有力的，像彫在紅木上的臉，掛着羞澀的笑容，在冬日-33°C，站在僵冷的戈壁大沙漠中，常常一連幾天都在駝背上渡過，為他所愛的，及和他一起旅行的人祈禱。

這樣的一個人，是出生自一個法國小鎮奧維約的一個11個孩子的家庭。德日進從他虔誠的母親，承受了堅強的信仰。很早的時候，他對於石塊，尤其是鐵片非常珍惜。他18歲時，進了耶穌會的初學院，他的信仰得到加深。一個洞悉人生的導師給他一生忘不了的教訓：

「他被釘的主，不但重視他的聖化，同時也重視他存在的自然發展。」以後，他對自然界的現象更加重了興趣。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日進到巴黎去認真的研讀地質學。在1922年獲得博士學位，受聘為法國天主教大學的地質學教授。翌年他被邀請到中國參加東蒙古的勘察工作，在航程中，他從船上遠遠望見的西乃山，他寫下了這樣的一封信給他的堂妹：

「我如果能夠去遊覽這岩石斜坡，那就好了。我不只要用我的錘子去試探它們，同時還要細聽，看看我能不能聽到從燃燒着的荊棘中發出來的聲音。不過，天主在沙漠中說話的時代不是已經過了嗎？……因為他所住的巔峯，不是

高不可攀的高山，而是在另一個更深的範圍之內的東西。」

其後，他又參加了發掘「北京猿人」的工作。第二次大戰期間，挖掘工作被逼完全停頓。他羈留在北京，寫下了鉅著「人的現象」把25年來的思想工作綜合了。內容主要是闡釋「宇宙逐漸趨向精神化的未來信念，人應該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更大的宇宙發展中最有責任的一部份。這個世界還是不斷的向一個更大的秩序和知覺開展。我們應該向着這個整體努力的方向奮力前進。……」



⑥ 史懷哲 (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

「1905年10月13日的那一天，我決意從事醫學研究，以便到赤道非洲去做醫生。這計劃遠在我的學生時代就已經形成，那時我感到自己能夠過着舒適的生活，而眼巴巴看着週遭這麼多人，正在和憂慮痛苦搏鬥，總有無限感慨。」

史懷哲醫生——一位人道主義者，被稱為「非洲之父」，雖然他擁有哲學、神學、醫學等博士的榮銜，（名譽博士學位十幾個）但稱他為醫生，比其他任何稱位更為恰當。史醫生誕生於1875年

德國的亞爾薩斯，父親是一個基督教的牧師。史懷德是個苦學的人，在他30歲之前，在研究科學、神學和藝術方面，已經光芒四射，大有成就。但他不願做一個空言的牧師，寧願捨棄舒適的生活，不顧毀難，獨排眾議，毅然辭去神學院院長的職位，專心習醫七年，然後到赤道非洲，在蠻荒地帶為土人解除疾苦。

在史醫生的自傳中，對他在非洲行醫的情況是這樣寫着的：「在開始的時候，我只能把一所古舊的雞棚當做診療室；到了深秋的時候，便已經能夠搬到河邊一座波紋鐵片蓋成的房子去。房子長26英尺，寬13英尺，屋頂是棕櫚樹葉蓋成的。最初，當我還沒有把藥品和器具的包裝打開的時候，已經被許多病人包圍起來了。他們主要的病症有瘧疾、麻瘋、痢疾，印度痘、酣睡症、惡性潰瘍，還有肺炎、心臟病、疝氣等等。以前在沒有醫生的情況下，他們每年都有一羣不幸的人，染病後就開始等着死亡的來臨。我在工作上遭遇極多的困難和阻碍，包括翻譯，打雜工作等等，還需要不斷地應付森林中野獸和白蟻的侵擾和損害，不知耗費去我們多少精力和時間。我的太太曾受過護士的訓練，她給了我莫大的幫助，她看護嚴重的病人，檢查紗布和綑帶、配藥、清理器具、準備外科手術的工作、施行麻醉等，還要料理煩雜的家務。」

史懷哲曾經三次到非洲工作，救活了無數的非洲土人。此外，他孜孜為學的精神，實在值得敬佩。無論在蠻荒、在牢獄、在集中營、在旅途上、在工作之暇，都無時無刻不在讀書或著述。他不但博學，並且精通幾國語言和文字。還是一位特出的風琴演奏家。他得到了1957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榮譽，實在當之無愧。



⑦德肋撒修女

(MOTHER TERESA)

「你要仁慈與慈悲，讓所有來求助的人離去時，都卸去一些重担，減去一些憂傷……不單給予他們你的照顧，更付出你的愛心。」

「現今，最嚴重的疾病，並不是麻瘋或肺病，而是被討厭、被忽視、被遺棄的感覺。……而這些人，正是無處棲身，並受着剝削、貪污、窮困、疾病等等的痛苦。」

德肋撒修女，在1979年獲贈諾貝爾和平獎後，被訪問時，說了以上的話。稍後，印度政府又頒贈印度最榮譽的巴勒列納獎給她，以表彰她對印度的特殊貢獻。這時，她已經69歲了。德肋撒出生于亞爾巴尼亞的一個小鎮，50年前，她從南斯拉夫到達印度的加爾各答，那時，到處都是丟棄的初生嬰兒和餓狗，她看見滿眼餓殍，一片人間地獄的景象。

德肋撒修女把第一個看見的病婦從街上救起，把她送去醫院。起初，他們不肯收容這婦人，德肋撒不肯離開，直至他們讓那婦人留下來。在同一天，她又在街上發現其他垂死的人，她請市政衛生部給她一個地方，好收留這些被遺棄的病人，市政府的官員就把她帶到嘉黎廟去，24小時內，德肋撒便把街上被遺棄的人都帶回那一座空置的建築物內。

最初，她只有五個盧比，漸漸地，當別人開始知道她的工作時，就給他們帶來金錢及一些日用品。後來，修女的舊學生都來幫忙，又有醫生、護士等自動前來幫助她。自此，她就留在那裏，默默地工作，以她的熱誠、勤懇和愛心，幫助了無數的孤兒、家庭，也救活了垂

死的病人，給他們帶來了溫暖和快樂。她說：「我希望他們知道，在這世界上，仍然有人真真正正地愛他們，需要他們，最低限度，在他們死前的幾小時，能夠明白到上主及人的愛。」

德肋撒修女在1950年皈依印度籍，同年10月，教宗允許了他們成為一個教區修會；15年後，他又使他們成為一個宗座修會。直到現在，印度人都稱頌她為「印度之星」。



⑧ 羅哲兄弟和泰賽 (ROGER SCHUTZ AND TAIZE)

「我們是誰？只是一個脆弱的小團體，靠着一個很不合常理的希望支持着。這個希望就是在受洗的孩子們和各地的人羣中製造和諧。我們這個團體有70位男基督徒，受召去做一項幾乎是我們能力以外的工作。而我們雖然人數有限，也全力回應每一個呼請，不管那是來自何方。」這是羅哲在1968年寫下的。

羅哲——這個動作敏捷的人，對大自然的美非常敏感，他有一雙時時注意聆聽的藍眼睛，一顆「探尋上主和人之愛」的心。羅哲出生在米羅高原的一間牧師府第，很小就被送離家到外地讀書，寄住在一個窮苦的法國家庭裏，很受這個天主教家庭的感動，却為當時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之間的缺乏愛心而擔憂。畢業後，他騎腳踏車去找尋一個真正屬於現代世界的地方。羅哲在泰賽看到一家莊院出售的廣告，他一路前去，注意到這個村莊人口稀少，處處充滿憂鬱。他問一個窮苦的老婦人那裏有旅舍或喝咖啡的地方，她說：「沒有，來和我一同吃罷。」當羅哲向她解釋自己的計劃時，她就懇求他說：「和我一同住，我真是太寂寞了。」羅哲就決定留下來，



買下了這間荒廢、破舊的莊院。

在最初兩年，只有他自己一個人，每天三次，自己唸修道的日課。及後，他收留那些從北面六哩外法國納粹統治區逃出來的猶太人和其他國家的人。在1944年法國光復，他們開辦孤兒院，收留由戰爭造成的孤兒。又請德國俘虜來住。他們其中一位兄弟是醫生，就在這裏行醫。他們開始耕種，和當地的農夫合作，使當地逐漸繁榮起來。

1949年復活節，他們會裏的七位兄弟發了終身願，宣誓獨身、財物共享和服從。1951年，他們開始派出小組兄弟去各地生活，有些遠至印度、南美各地。他們自己謀生，衣著和當地人一樣。不過，他們在人羣中，都能成為喜悅和友愛的標誌。他們的團體共聚是一年一次。他們的崇拜禮儀，使每個人都覺得自由。人們站、跪、坐、或盤膝打坐在地上，各適其適。大家一齊唱歌，禮儀完結後還有一段靜默。羅哲指出：祈禱並不是一種責任，而是一份悅樂；在崇拜的時候，要整個的向上主投降，讓祂進入及存在於我們的最深處，不但完全佔有我們的心靈，也佔有我們的肉身。

他們的團體不斷發展，越來越多人湧到泰賽。大部份人都是普通的基督徒，來自各國的，大多數是25歲以下的青年人。他們堅持再不容許世界各地的人成為自己的犧牲品。他們喊出了他們的目標：「通過奮鬥和默觀，以成為與主共融的男女。」

然而，默觀是什麼？「這不外是我們整個存在呈現於上主面前，包括我們的愛慕，而完全被上主愛的實體徹底攫取。……默觀加強我們對上主的愛，通過與上主的愛密切結合，也能使我們去愛其他的人。」

「我們要帶着怡悅和無窮的感恩，永遠不要怕在黎明到來以前，對基督、你的主，讚美、稱頌和歌唱。」